

文化主體策略？ 後殖民角度的反思

彭榮邦 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如果我們以 1980 年 12 月在中央研究院主辦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為指標性事件，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在台灣的發展，正逐步邁向第四十個年頭。在這期間，正如李維倫教授在文中所指出，並不乏對心理學的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討論，特別是在《本土心理學研究》這份期刊當中。

在這同時，關心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人多少也都察覺到，在這個運動的內部，其實隱然已經出現了一些可辨的「路線」，但它們之間的差異何在，倘未有學者進行系統性的理路分疏。這個理論工作，或許因為工程太過浩大，多年來一直沒有人真正扛起來好好做。這次李維倫教授以這篇長文（以下簡稱「李文」）擔起這麼吃力、又不見得討好的工作，將有助於已經參與其中、或即將投入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人，更清楚地看見彼此的論述位置及行進方向。我相信，這不僅是個重要、而且也是必要的理論工作。

一、理路分疏的邏輯與策略

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對台灣的心理學論述最具體的貢獻之一，就是增加了所謂「心理學思考」的複雜度。《本土心理學研究》創刊

之際，我還是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的學生，當時系上最激烈的討論，常常出現在週三的專題報告時間。筆者清楚記得，當時余德慧教授在報告他的研究成果時，系上不少老師及研究生對於他偏離科學心理學的研究取向，有相當直接的挑戰，甚至質疑他的研究充滿了太多的「哲學語彙」，實在稱不上是「心理學研究」。不過，由於參與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前輩學者們的努力，在二十幾年後的今天，如果對「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等以往被認為是「哲學語彙」的概念，沒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和瞭解，已經很難參與到本土心理學論述中最具思辨性的討論之中。

然而，就分辨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內部的路線而言，這種已然增加的思考複雜度，其實也增加了對不同路線進行理路分疏時的難度，尤其是不同的本土化路線，可能根基在完全不同的知識論、甚至本體論的基礎時，更是如此。這是李維倫教授在釐清不同學者論述時所面對的難題，而身為讀者的我們，也得知道這個理論爬梳工作的難度。一開始，我想先以「李文」中所提及的楊國樞及黃光國兩位教授在面對路線差異時的處理方式，做為評論「李文」的起點。⁽¹⁾

楊國樞教授，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開拓者及領導者，在他扛起「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大旗的長文〈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中，就對不同的學術路線（主要顯示為方法論的差異），採取「不管黑貓或白貓，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的折衷看法。他認為，「不管是實證論的方法也好，現象論的方法也好，詮釋學的方法也好，等等種種，只要能增進對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的瞭解，都可以採用」（楊國樞，1993，頁 27）。這些不同的方法論，他進一步說明，在「成效上可能有所差異，也可能難分軒輊，但它

們對當地人民之心理與行為現象所提供的描述、分析及解釋，卻可以相輔相成，共同組成一套比較完整而有系統的本土性知識體系」（頁 40）。楊國樞教授以其學界大老的身分，主張心理學本土化研究應當鼓勵「多元範型」（multiple paradigm），對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後來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否則，在當時以量化實證研究為主的學術氛圍中，對心理學有不同於主流見解的學者其實很難找到立足之地，台灣的心理學論述也不會有今天如此多元的樣貌。不過，在心理學研究的多元範型之外，楊國樞教授也試圖以「本土契合性」做為心理學研究本土化程度的判準，並且在後續的討論中引發了多方面的爭辯（余德慧，1997；梁覺、吳培冠，1997；楊中芳，1997；楊國樞，1997b；葉啟政，1997；葛魯嘉，1997；黃光國，1997；黃應貴，1997）。即使如此，楊國樞教授試圖以兼容並蓄的方式，涵納不同取向的心理學研究，這個立場是始終沒有改變的（楊國樞，1997a，2005）。

黃光國教授處理路線差異的方式則是相當具有他的個人風格，但從其思想的發展上來看，也的確具有一貫性。早期，黃光國教授在《本土心理學研究》中評論楊中芳教授及余德慧教授的研究論文時（余德慧，1996；楊中芳，1993），採取的是一種以「內在可理解性」（學術主張要前後一貫）和「社會可理解性」（禁得起學術社群的公開辯論）為原則的學術標準，以此來評論同儕學者的研究（黃光國，1996，頁 234）。他認為，心理學者並不需要強加區分「本土概念」和「外來概念」，但「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所使用的各種理論的預設、邏輯和適用範圍」（黃光國，1993，頁 198）。這樣的堅持，在 1997 年他評論楊國樞教授闡述「本土契合性」的研究論文時（楊國樞，1997b），有了更清楚的形貌。原先以「內在可理解性」和「社會可理解性」為圭臬的學術判準，在這篇評論

中已經發展為對心理學知識背後的「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必要認識。他承認心理學的確存在著不同的樣態和學術判準，不過每一種心理學都有其「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台灣心理學的問題就在於「急著想要『迎頭趕上』，學習或模倣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卻忘了要『從根做起』，深入探討西方社會科學的知識論和方法論基礎」，因此才出現了「學術實踐主體性喪失」的現象（黃光國，1997，頁 168-169）。此後，黃光國教授對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強調，逐漸演變成一種對西方科學哲學的倚重，甚至以科學哲學做為批判和建構理論的知識座標。他在 1998 年發表的〈人能弘道·道通為一：心理學本土化的方法論挑戰及其回應〉一文中，就清楚地以科學哲學的論述為知識座標，對同儕學者的研究加以評論和回應（黃光國，1998）。不過，黃光國教授這種以科學哲學為知識座標來辨識差異的方式，在早期曾經被楊國樞教授回應為是一種「扣帽子」的做法，認為他並沒有「仔細弄清楚人家論述的真意，然後再就事論事地評論」，總是先「豎立稻草人」，然後再大做文章（楊國樞，1997a，頁 206-209）。即使如此，黃光國教授對於西方科學哲學的強調和倚重，在之後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即使知道許多本土心理學學者並不見得同意他的做法，他在 2010 年為《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撰寫的文章中，還是這麼重申他的主張：「在非西方國家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必須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掌握住西方人從事學術研究的精神意索，能夠對西方理論進行批判，同時又能建構適於本土社會的理論，以之作為實徵研究的指引。」（黃光國，2010，頁 19）

相較於楊國樞教授近乎「家長式」的包容，和黃光國教授以科學哲學為知識座標、強力「含攝」其他同儕學者論述的做法，李維倫教授所進行的，則是一種較為細緻的理論分疏工作。首先，他以

自己早年所撰寫的文章中對心理學本土化的「可能性」及「合法性」的提問為基礎（李維倫，1995），重新琢磨出本土心理學所面臨的兩個根本問題（「如何看待西方或北美心理學對其他地區學術與實務的支配現象並做出反應？」以及「如何追求切合於本土社會文化的心理學知識但又朝向人類普同的理解？」）。不僅如此，他更進一步體認到，這幾十年來台灣的心理學學者對這兩個根本問題的回應，都是一種進占到特定立足點的「文化主體行動策略」。這兩個根本問題及對「文化主體策略」的認識，於是成為李維倫教授仔細閱讀楊國樞教授、黃光國教授、宋文里教授，以及余德慧教授等四位具代表性的本土心理學學者論述的視角，並以此為經緯，逐步爬梳出四位學者不同的論述理路。

我必須說，即使不進入對本土心理學所面臨的兩個根本問題的回應和所採取的文化主體策略，「李文」對四位學者多年來的著述所進行的理論爬梳，本身就十分可觀，值得再三閱讀。從一位學者多年的著述中追索其思想軌跡，並且從中琢磨出貫穿於其中的思想體系或風格，本來就是一件相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遑論處理四位學者的著述！更何況，除了被要求撰寫回應文章之外，台灣的心理學學者往往不太閱讀彼此的著述，更談不上系統性地瞭解或揣摩彼此的思想體系，這對於一個學術社群而言，當然是個相當奇怪的現象。以往論者常以「自古文人相輕」來說明這個現象，不過若深究之，這種「輕本土」的現象，還有「重美國」的另外一面。這種「輕本土、重美國」的心態，反映出台灣心理學界的現況，距離一個具有主體性的學術社群，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李文」在爬梳四位學者論述時所展現出來的嚴謹態度，不僅是對本土心理學所累積的思想果實的重視，同時也是對這個學術社群主體性的正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發現，李維倫教授之所以費心爬梳楊、黃、宋、

余四位學者的著述，並不僅止於單純的學術旨趣，而是有著運動的策略考量：他想藉由這篇文章，為本土心理學這個學術社群撰寫歷史，而且是心理學思想論辯的歷史。

不可諱言，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台灣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確實面臨著動能衰退、而且可能後繼無人的危機。這個危機的形成，自然有其複雜的內部與外部因素，不過歷史意識的缺乏，確實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在給「芭樂人類學」網站的一篇文章中（彭榮邦，2015）特別談到這個問題。我在文中指出，台灣的心理學界在不加批判的情況下，接受了心理學「起源於歐洲、發皇於美國」這套被美國主流心理學教科書普遍採用的歷史敘事，甚至把它當作心理學「真正的」歷史。可是如果批判地檢視，我們會發現，這個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心理學歷史，其實是大有問題的。面對任何一個心理學的歷史敘事，我們都必須追問兩個根本問題：這是誰的心理學？為何如此書寫歷史？這個被我稱為「大河敘事」的心理學歷史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並不是屬於「我們」的故事，而是美國主流心理學為了凝聚自己的學術社群、證成其知識合法性而書寫的歷史。這個歷史敘事簡單易懂，但卻忽略了心理學內部的歧異多元性，甚至對於其他地方的心理學知識和體系具有強烈的排他性（Brock, 2006）。接受了這個既有特殊性、又充滿美國味，而且將台灣等亞洲國家排除在外的心理學歷史，它的後果就是一種「張冠李戴」的弔詭歷史意識，認為所有值得討論和關注的知識和事件都不發生在「此地」，而是發生在「他方」，於是不自覺地把本土學術社群的思想工作邊陲化，形成了一種無歷史的真空狀態。在這個意義上，「李文」以四位學者的論述為基底所架構出來的歷史，不是為了要突顯出任何人的偉大，而是為下一代本土心理學學者所做的思想準備，讓他們在面對處於霸權地位的北美心理學時，有屬

於本土心理學這個學術社群的思想辯論做為指路明燈，藉此辨識、甚至如李維倫教授所期待，「孕育出下一階段的本土心理學理論論述與行動」。

綜上所言，我們可以看到「李文」對於楊、黃、宋、余四位學者著述的理論分疏，是一種思想論辯的歷史書寫，有其運動發展策略上的考量。進一步說，「李文」對於四位學者不同路線的分辨，並不是就此分道揚鑣的切割，而是在尋找一種「彼此雖然有差異，但還是可以共同前進」的可能性。在「李文」中，楊國樞教授的論述被辨識為「以本土化心理學為最高位階」的主體策略，黃光國教授的論述被辨識為「以科學哲學為平台挑戰西方學術霸權」的主體策略，宋文里教授的論述被辨識為「漢語文化心理學」的主體策略，而余德慧教授的論述則被辨識為「從語言到存在」的主體策略。「李文」又進一步將這四種主體策略，統整為匯流於強調對心理學知識「概念化與再概念化」的兩種模式：第一種是以楊、黃的論述為代表的「水平模式」，它強調的是「理論主體性」，於其中「本土」是「由不同地域文化差異的『東西之別』來定義」，而其本土化目標在於「建立以地域文化為架構的本土心理學理論知識，使得華人心理學具備有別於西方心理學的理论主體性」；第二種是以宋、余的論述為代表的「垂直模式」，它強調的是「生活主體性」，於其中「本土」指的是「回到說話者的當下存在處境」，其本土化目標是讓在地的生活經驗不再失語，而且有貼切而深刻的話語可說。「李文」更指出，這兩種模式「不見得是本土心理學的歧異選項」，只要雙方能理解彼此的差異是一種「主體策略」的不同，就能夠以溝通為基礎，進一步結合為兼具理論主體性與生活主體性考量的「文化主體策略」，並且以「再概念化」的知識操作為橋接點，「做為基礎的生活主體經驗讓再概念化西方知識並生產出本土理論成為

可能；而東西有別的理论主體地位讓生活主體性在面對文化他者時有了說明彼此的話語」。對於李維倫教授而言，這個整體性的文化主體策略，是對本土心理學所面臨的兩個根本問題的回答，它一方面有鬆動北美心理學學術霸權的效果，也消解了本土心理學在面對質問其知識的普遍性和殊異性上的難題。誠如他在結論中所述，「當奠基於理論主體性與生活主體性的溝通成為本土心理學的根本典範（paradigm），學術的霸權支配就失去了它的立足點。『普遍：殊異』也不再成為問題，因為『殊異』是溝通的起點，而溝通的目標是相互理解，而非普遍同一的追求」。「李文」對於四位學者的論述所彰顯的主體策略的辨識，以及進一步將它們結合為整體性文化主體策略的闡述，對心理學本土化運動接下來能夠在對內及對外的殊異中求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二、呼之欲出的後殖民觀點

評論完李維倫教授的文章，我想從後殖民論述（postcolonial discourse）的角度進行補充。首先，我知道殖民或後殖民論述不是台灣的心理學論述經常援引的思想資源，即使在行文中出現了「殖民」、「反殖民」、「後殖民」等詞彙，它們被援引的意義往往與後殖民論述中的使用有所差異。當然，本土心理學論述並不是非引入後殖民論述的話語不可。不過，本土心理學論述發展到今天，其實已經開始出現以往在心理學論述中不太出現、或者在語用上不同於以往的概念，例如在「李文」中居於關鍵地位的「主體」（subject）或「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概念。這些對心理學來說還有點陌生的概念，其實在後殖民論述中已經有其漫長的思辨歷史，是前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在血淚中掙扎出來的思想結晶。況且，所謂的「心

理學本土化運動」，難道不是台灣的心理學學者在一次又一次的殖民處境中尋找出路的具體結果嗎？以往或許是因為對美國主流心理學的亦步亦趨，也因為台灣社會長期在「反共親美」地緣政治下的高壓統治，所以這些被視為「顛覆政局」的後殖民論述沒有進入心理學的視野，成為本土化論述的思想資源。但是在台灣的文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等諸多人文社會學科積極從後殖民論述汲取養分之際，我們也差不多到了該重視後殖民論述的時候，並且積極從中尋求包括歷史、思想及運動策略上的啟發。

從後殖民的角度來看，不管是「科學」或是「研究」，都不是什麼特別「崇高」的事業。對被殖民者來說，它甚至是個髒字，因為殖民者以「科學」或「研究」之名，在殖民地幾乎是壞事做盡（Smith, 1999）。很遺憾地，心理學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例外。因此，後殖民學者會想辦法褪去「科學」或「研究」的光環，而考察它做為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的向度。如果把心理學還原到這個向度，心理學一直以來對待非白、非歐裔的這些「他者」（Other）和他們的傳統其實並不慈悲，不僅曾經是科學種族主義的幫凶（Holliday & Holmes, 2003），而且做為西方學科知識體系的成員之一，它也是被殖民者試圖建立有異於西方的知識文化時的持續障礙（Staeuble, 2006）。⁽²⁾

相較於其他的學科，心理學做為一種社會實踐，是不是有什麼特別之處？心理學史學者 Graham Richards（1987）從歐美心理學的角度指出，心理學和自然科學存在著一種本質性的差異，因為心理學的知識和它所研究的對象之間，存在著一種反身性的關係（reflexive relation）。也就是說，心理學是源自於在地心理生活的一門學科，某個心理範疇的適切與否，某個心理學理論的成功與否，相當程度是取決於在地社群能否從它們「照見自己」，亦即，

它們的意涵及所蘊含的生命關照，能否呼應人們說不太明白的感受和知覺，滿足人們希望它們可以滿足的需求。這樣的一種「源生」與「反照」的關係，就是 Richards 所謂的反身性關係。

心理學做為一門學科知識傳播到非西方社會之後，恰恰好就是在「反身性關係」這個向度上出了問題。心理學知識與在地心理生活之間反身性關係的斷裂，我在〈人文的凝視——追尋余德慧先生逝去未遠的身影〉一文中（彭榮邦，出版中），將它稱之為中文心理學的「文化失語」（cultural aphasia）現象，而且我在文中指出，這個文化失語的現象所暴露出來的，其實就是中文心理學的「殖民性」（coloniality），而心理學本土化運動正是台灣的心理學學者對中文心理學的殖民性所展開的多面向、而且是逐步深化的反省。⁽³⁾

台灣的心理學本土化論述中關於「主體性」的思考，大致上是在這個脈絡之下展開。最早，楊國樞教授並沒有質疑西方心理學所代表的普遍性，因此他所強調的「主體性」問題，是研究的主體性（能夠貼近「受研究者本位」），並沒有所謂建立「本土心理學」的問題（楊國樞，1982，頁 181）。然而，從楊國樞教授在 1993 年發表的文章中（楊國樞，1993）我們可以發現，所謂「西方心理學」所代表的普遍性已經受到質疑，而且西方心理學內部的異質性也被指了出來：美國心理學和其他地方的心理學一樣，都是一種「本土心理學」（頁 42）。此後，本土化論述中的「主體性」問題，才開始呈現為「以建立地域性的本土心理學」為目標的學術社群主體性。若是如此，「李文」中把楊國樞教授的論述指認為追求「理論主體性」的主體策略，可能是界定得小了些。

真正可以完全被稱為追求「理論主體性」的，應該是黃光國教授的論述。黃光國教授一向強調「理論建構」在學術工作的核心重要性，他早期評論同儕學者時強調的「內在可理解性」和「社會可

理解性」，可以被視為理論建構的內在性和社群性的要求。而他的本土化論述對科學哲學的倚重，其實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對理論建構的「完整性」的要求。他認為本土心理學學者在建構理論時，必須知道自已的研究方法在知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哲學基礎，而對他來說，這個哲學基礎是明明白白呈現在科學哲學裡。因此，他才會主張科學哲學的認識對本土心理學的理論建構工作有絕對的必要性。不僅如此，黃光國教授更以科學哲學為知識座標，把本土心理學的理論工作定位在批判實在論（後來加入了多重哲學典範）的位置。在這個基礎上，本土心理學可以建構出「含攝文化的理論」，和建立在「個體主義」預設之上的西方心理學理論並駕齊驅。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李文」中把楊、黃兩位教授的論述視為以「東西有別」做為面對「文化他者」時的理論主體位置，是大致沒錯的（「東西有別的理论主體地位讓生活主體性在面對文化他者時有了說明彼此的話語」）。如果說，楊、黃兩位教授的論述是對中文心理學的殖民性所展開的反省，那麼「李文」依據他們二位的論述所辨識出來的「理論主體性」，是一個什麼樣的主體策略？讓我們先對照殖民地知識分子的鬥爭經驗，藉以澄清這個問題。最初，殖民地知識分子是把殖民性視為一個「外在」的對象來看待的。因此，一開始的殖民地鬥爭，是以驅逐殖民者、建立自己的國家為策略。然而，要建立起什麼樣的國家？殖民地知識分子最初的答案是，「和歐美強權一樣強大的國家」。這樣的策略，和楊、黃兩位教授的論述所彰顯的主體策略，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這樣的主體策略是把殖民性當作是一個「外在對象」來對抗，雖然不一定要「驅除韃虜」，但即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⁴⁾還是受限在與美國主流心理學的鏡像關係之中（彭榮邦，出版中）。

後殖民論述的興起，與反殖民論述的策略旨點有很大的關係。

殖民對被殖民者最大的衝擊，就是把人從他賴以安身立命的歷史感與歸屬感裡剝離開來，被迫以一種委屈的姿態活著。因此，被殖民者的人性是被殖民處境扭曲的，特別是經過了長期的殖民之後。被殖民者不管是內在的心理層面——這包括他的自我認識，也就是歷史感的部分；他的慾望，這是屬於無意識、較不易察覺的部分，還是外在的社會性層面——主要是被殖民者怎麼組織群聚，這其中當然包括了在反殖民過程中誕生的國家、各種社團組織，學術社群當然也是其一，都因為殖民而出現了嚴重的人性扭曲。

印度的後殖民心理學學者南地（Ashis Nandy）在他 1983 年的著作《親內的敵人》（*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裡，把這種殖民所造成的人性扭曲，稱之為「殖民的第二種形式」（second form of colonization），第一種指的是當然就是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燒殺掠奪，這種我們比較熟悉的、比較表象的殘酷。南地說，第二種形式的殖民：

不僅是一種身體的殖民，也是一種心理的殖民，它藉由釋放殖民社會的內在力量，徹底地改變了殖民社會文化裡的優先順序。在這個過程中，「現代西方」從一個時空的實體，轉變為一個心理的範疇。「西方」因此無所不在了，不僅在西方之內，也在西方之外；在社會結構之中，也在人的心理。（Nandy, 1983, p. xi）

做為「心理範疇」的西方，而非實體性的西方，是眾多的殖民地知識分子在血泊中建國、打贏了殖民地戰爭之後的慘痛發現。這種親密的、內在的「西方」，在後殖民地時代往往成了一種普遍性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參考座標 / 理想型，它在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運作，卻為人們所習以不察。這也就是說，第二種形式的殖民「表

面上」是不殘酷的，被殖民者絲毫不覺「內在殖民」的存在，而誤以為殖民的時代已經遠揚，已經塵封在歷史的過去。

發現殖民的第二種形式的通常不是別人，而是內在受到殖民「荼害」最深的知識分子。如果我們把台灣的「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當作是一個「思想事件」⁽⁵⁾來考察，我們會發現，本土心理學之所以在內部有這麼紛雜的樣貌，不僅沒有一個典範性的理論知識與實踐，而且在歷史的進展中還會「變」（從「中國化」變成「本土化」），這和參與學者各自發現這種「內在殖民」的知識位置，以及從這個位置上「看」到了什麼，有很大的關係。

相較於楊、黃兩位的論述，宋、余兩位教授的論述所彰顯的主體策略，已經開始把中文心理學的「殖民性」視為一種「內在」的問題，而不是和「外在對象」對抗的問題。這也就是說，他們所關注和處理的，是心理學做為一種社會實踐如何從它與生活世界的關係，來重新建構或恢復其「反身性」的問題，只是一個在心理學的「失語」現象上下功夫，一個則是把心理學逼入面對受苦的現場（亦即，臨床的現場）。「李文」中把兩人論述的主體策略指認為「生活主體性」，這也是大致沒錯的。

傅大為在 1992 年的〈歷史建構、邊陲策略與「中國化」〉一文中，曾經從 80 年代的權力—知識關係考察了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在「中國化」時期，心理學、人類學與社會學這個他所謂的「主流鐵三角」，是如何利用「中國化」的這個知識策略，在台灣這個學術邊緣進行新舊學術世代的攻防（傅大為，1992，以下簡稱「傅文」）。「傅文」在當時的確是鏗鏘有聲的一篇文章，我想在當時拜讀的人都會有一種「心頭為之一震」的感受，但如果從以今觀古的「後見之明」來看，「傅文」當時對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動能考察，或許有點太「小看」了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他不僅忽略了參與

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學者的異質性（這點很重要，因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在後來的發展的確是出現了不只一種論述聚集），也間接否定了心理學本土化運動是台灣心理學學者發現自己的「殖民性」的一個重要思想事件。

書寫至此，我希望多少已經帶給各位一些後殖民論述的敏感度。帶著這樣的敏感度，如果我們重新回看本土心理學論述當中的一些重要文獻，應該可以發現，如果從思想事件的角度來看，台灣本土心理學運動的浮現，正是受第二種形式的殖民荼毒最深的心理學學者對這種「內在殖民性」的逐步發現。不過，我希望讀者們不是以一種事不關己的態度來看，因為，相較於 1980 年代的時空，這種做為參考座標的理想化西方（idealized West），對於心理學以及整個學術界的箝制其實是變得更結構化了，而且，這個枷鎖還是我們給自己戴上的。

最後，讓我們帶著後殖民論述的敏感度，閱讀一段本土化論述中最常被引用的文字：

我們所探討的對象雖是中國社會與中國人，所採用的理論與方法卻幾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是中國人，在從事研究工作時，我們卻變成了西方人。我們有意無意地抑制自己中國式的思想觀念與哲學取向，使其難以表現在研究的歷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評的接受與承襲西方的問題、理論及方法。（楊國樞、文崇一主編，1982，頁 ii）

從楊國樞教授的文字裡，其實我們可以讀到，做為一個「中國人」，他已經察覺到自己與歷史傳統之間的斷裂。在日常生活中他可以是一個有歷史感的人，「中國式的想法」不會被抑制；但是做為一個心理學學者，這些屬於他的「人」的一部分，都要被抑制。

然而，被「誰」或「什麼」抑制？「我們」有意無意地抑制「自己」，抑制的和被抑制的都是「我們自己」，而那個內在的檢審機制（ *censorship* ），就是已然內化的、做為心理範疇的「西方」，而被打壓的部分則是構成了文化認同的、在歷史中呼吸生活的我。這個做為心理範疇的「西方」，並不會給人安適感，反倒是在人的內部創造出兩個互相拮抗的主體位置——要麼，就認同被內化的「西方」，要麼，就認同被打壓的「非西方」。

如果對照楊國樞教授在 1997 年自述從事本土心理學運動的心路歷程時所寫的一段文字，我們可以發現，成為心理學者就是一個逐步與「認同西方」的這個主體位置密合的過程：

As a graduate student, I tried very hard to learn whatever I could from Western (mainly American and British) psychology, just like a dry sponge absorbing water. Upon my graduation with a doctoral degree, I congratulated myself for having received probably the best training in scientific psychology available anywhere in the whole world. What I did not realise was that I had been thoroughly 'brainwashed', so to speak, to become an almost 100 percent Westernised psychologist. (Yang, 1997, p. 63)

從上述文字裡我們可以看到，要進駐到「心理學家」的這個主體位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由想要成為內在的那個理想化西方的強大渴望（“just like a dry sponge absorbing water”）所推動的一個辛苦的「自我鍛造」過程。這個理想化的西方，對於它在人的內在所裂解出來的兩個主體位置是不平等對待的，它拒斥原生文化的主體位置，但卻渴望優勢文化的主體位置，而成為一個優秀的心理學家的過程，恰恰是透過拒斥原生的主體位置，來進駐文化優勢的主體位置的一個「自我鍛造」的過程。事實上，在還沒有察覺到

這個渴望本身的殖民性之前，這種「自我鍛造」是一種成就，沒有超常的意志力與自我紀律是辦不到的。

由於這個由「十年寒窗」所鍛造出來的、所謂「學者」的這個主體位置，它處於「文化中介」的特殊位置，掌握了相當的社會資源，一般的學者就算發現了，也不見得願意去處理這個殖民在內部的「西方」，因為所要面對的不僅是自己的內在分裂，外在的社會文化實際上也已經以這個心理範疇的「西方」為結構的核心，面對這個「西方」實在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心理學本土化運動走來一路蜿蜒，雖然參與這個運動的心理學學者們，在各自不同的知識位置上對這個內在的西方有不同的「切」入方式，但是大抵做的都是這種「剖心肝」的工作。引入了後殖民論述的觀點後，我們可以發現，「本土心理學」是從發現中文心理學的「殖民性」開始聚集的一個運動，它的起點，就是看見了「殖民」對人性的嚴重扭曲。怎麼樣能夠繼續「開著眼」，逐步祛除這種因為殖民而造成的內在、外在的人性扭曲？我想，一個歷史與批判的內在檢視是必要的，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使一個運動保持它的能動性，而又不陷入「盲動」，而李維倫教授的這篇文章，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相當重要的起始點。

註 釋

- (1) 我之所以不處理宋文里及余德慧兩位教授的看法，主要是因為他們幾乎從一開始就決定走迥異於科學心理學的道路，不管這條道路是被稱為「人文心理學」或「文化心理學」。因此對他們來說，「路線」的差別根本就是起點，一旦決定踏上人煙罕至的道路，差異就沒那麼重要了。
- (2) 關於心理學與他者的關係，更詳盡的論述請參考筆者所撰寫的

- 〈想像的他者·他者的想像〉（彭榮邦，2014）。
- (3) 詳細論述請參考〈人文的凝視——追尋余德慧先生逝去未遠的身影〉（彭榮邦，出版中）。
- (4) 黃光國教授在 2016 年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一場名為「西方謬誤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演講中是這麼說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要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儒家文化作為主體，吸納西方文明的菁華，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就能夠促成儒家文化第三次的現代化，開創出嶄新的中華文明。」
- (5) 「思想事件」的說法，是為了要聚焦在思想的歷史性(historicity)，也就是思想得以以某種歷史形貌出現的可能性條件。

參考文獻

- 余德慧（1996）：〈文化心理學的詮釋之道〉。《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6，146-202。
- 余德慧（1997）：〈凸顯己意，六經皆為我文註腳〉。《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8，141-152。
- 傅大為（1992）：〈歷史建構、邊陲策略與「中國化」——對台灣「行為及社會科學中國化」提法的一思想史研究〉。見傅大為（主編）：《異時空裡的知識追逐——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論文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彭榮邦（2014）：〈想像的他者·他者的想像〉。見劉斐玟、朱瑞玲（主編）：《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彭榮邦（2015）：〈歷史作為一種敘事：誰的心理學？為何如此歷史？〉。

取自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461>

- 彭榮邦（出版中）：〈人文的凝視——追尋余德慧先生逝去未遠的身影〉。
- 李維倫（1995）：〈本土心理學必須超越「心理實體論」〉。《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4，367-379。
- 梁 覺、吳培冠（1997）：〈本土心理學的國際化〉。《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8，173-180。
- 楊中芳（1993）：〈試論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學研究：兼評現階段之研究成果〉。《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1，122-183。
- 楊中芳（1997）：〈需要這樣細分嗎？〉。《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8，153-158。
- 楊國樞（1982）：〈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層次與方向〉。見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楊國樞（1993）：〈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1，6-88。
- 楊國樞（1997a）：〈三論本土契合性：進一步的澄清〉。《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8，197-237。
- 楊國樞（1997b）：〈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關問題〉。《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8，75-120。
- 楊國樞（2005）：〈本土化心理學的意義與發展〉。見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楊國樞、文崇一（主編）（1982）：《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葉啟政（1997）：〈「本土契合性」的另類思考〉。《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8，121-139。
- 葛魯嘉（1997）：〈心理學研究本土化的立足點〉。《本土心理學研究》

- (台北)，8，187-196。
- 黃光國 (1993)：〈評「深化」本土心理學研究的方法〉。《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1，193-200。
- 黃光國 (1996)：〈文化、知識與存在：反思那「不可反思的」〉。《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6，218-238。
- 黃光國 (1997)：〈本土契合性：學術研究的方向或學術研究的判準〉。《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8，159-171。
- 黃光國 (1998)：〈人能弘道·道通為一：心理學本土化的方法論挑戰及其回應〉。《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9，35。
- 黃光國 (2010)：〈走出「典範移植」的困境：論非西方國家的學者養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台北)，11(4)，15-20。
- 黃應貴 (1997)：〈從人類學的立場看心理學本土化與本土契合性〉。《本土心理學研究》(台北)，8，181-186。
- Brock, A. C. (2006). Introduction. In A. C. Brock (Ed.), *Internationalizing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olliday, B. G., & Holmes, A. L. (2003). A tale of challenge and change: A history and chron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psych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G. Bernal, J. E. Trimble, A. K. Burlew, & F. T. L. Leong (Eds.), *Handbook of racial &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Nandy, A.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 G. (1987). Of what is history of psychology a history?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2), 201-211.
- Smith, L. T. (1999).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 Staeuble, I. (2006). Psychology in the Eurocentric orde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olonial constitution, cultural imperialist expansion, postcolonial critique. In A. C. Brock (Ed.), *Internationalizing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Yang, K. S. (楊國樞) (1997). Indigenizing westernized Chinese psychology. In M. H. Bond (Ed.), *Working at the interface of cultures: Eighteen lives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完稿日期：2016 年 12 月 18 日

作者簡介

彭榮邦：美國杜肯大學臨床心理學博士，現任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專任助理教授。修習碩士期間師從余德慧先生接觸生死學領域，深入探究現代人對於生存、死亡，以及受苦的心理處境與轉化等議題。研究興趣包括現象心理學、精神分析、本土心理學、批判與後殖民心理學，譯有《好走：臨終時刻的心靈轉化》、《聆聽疼痛：為痛苦尋找話語、慈悲與寬慰》等書。rongbang@mail.tcu.edu.tw。